

川大史学

(第二辑)

中国古代史卷

主编 刘复生
副主编 栗品孝

前志續志俱無之縣令長可見其人也

嘉州

南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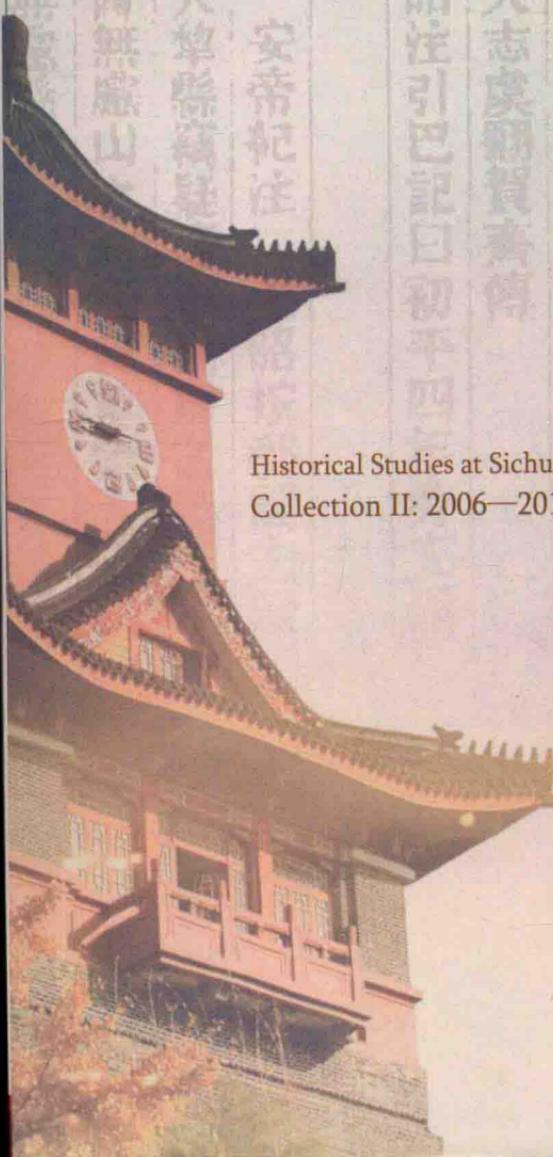
充 蜀志張庭博

東屬國

夫翠

令 安帝紀注

夫翠後人因下文有醫無處山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

国家重点大学，是国家「二一一工程」和「九八五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由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三所全国重点大学于一九九四年四月和二〇〇〇年九月两次「强强合并」组建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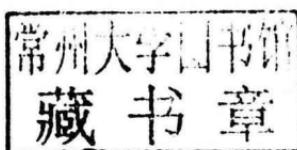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川大史学

(第二辑)

中国古代史卷

主编 刘复生
副主编 粟品孝



Historical Studies at Sichuan University
Collection II: 2006—2016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袁 捷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康 燕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大史学. 中国古代史卷. 第二辑 / 刘复生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614-9860-6

I. ①川… II. ①刘… III. ①史学—文集②中国历史
—古代史—文集 IV. ①K0-53②K220.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4032 号

书名 川大史学(第二辑)·中国古代史卷

主 编 刘复生

副 主 编 粟品孝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9860-6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9.625

字 数 52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川大史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罗志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石 硕 刘复生 何一民 陈廷湘
杨天宏 原祖杰 彭裕商 舒大刚 霍 巍

《川大史学》工作委员会

组长：霍 巍

副组长：舒大刚（常务）

成员：

李德英 李映福 李志勇 鲍成志 姜 莉

前　言

作为川大史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中国古代史专业在我校徐中舒、蒙文通、缪钺、蒙思明、任乃强、吴天墀等老一辈历史学家的辛勤耕耘和带动下，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和研究优势。2006年，我们曾对川大古代史专业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作过一次梳理和总结，选编了《川大史学·中国古代史卷》，作为川大建立110周年的一份献礼。如今我们再续前缘，编选新卷，对过去十年的研究工作做一新的检视。

这十年，川大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仍然保持了注重断代史和专门史及通史相结合的传统。不仅延续了先秦史和宋史的研究优势，秦汉史和明清史研究也有重要拓展。在各项古代专史的研究如民族史、宗教史、科技史、学术史和经济史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重视历史文献的整理和辨析，是川大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大特色。近十年既有对巴县档案、《三国志》等方面的继续整理疏证，也有对历史地理文献和东亚汉籍整理的开拓。注重巴蜀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是川大史学一以贯之的传统，最近十年也有诸多进展，研究内容涉及地方典籍、少数民族、学术文化、重要人物和民风民俗等方方面面，学者组织了《成都通史》《巴蜀文化通史》等大型多卷本地方通史的编撰，“蜀学”研究尤多进展。

本卷集中收录的28篇论文，正是基于上述研究传统和研究特色的一个小结，力图能够反映近十年川大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大略面貌。薪火相传，代有其人，本卷作者的年龄跨度大体整整一

个甲子。蒙默、胡昭曦、杨耀坤等多位前辈学者笔耕不辍，再推学术精品，使本卷内容尤显厚重，谨在此向他们表达崇高的敬意！

学术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持续努力。近十年来，一些老师光荣退休，有的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同时，一些学术新锐带着新时代的气息陆续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注重知识创新与中外文化交流，锐意进取，正在为川大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明天谱写更加绚丽的新景！

编 者

2016年3月

目 录

《蜀王本纪》“左言”“左衽”辨释及推论.....	蒙 默 (1)
古蜀治水传统与华夏文明 ——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水	徐亮工 (12)
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及其考古学印证	彭邦本 (34)
马王堆帛画与汉初“道者”的信仰	姜 生 (50)
“楚屈子赤角簎”新研.....	李世佳 (108)
说“汉家”：其涵义之神化与两汉间的天命竞夺	冯渝杰 (122)
《三国志》述论.....	杨耀坤 (169)
三国时代全面的创新性成就	方北辰 (205)
吐谷浑西迁之原因 ——兼谈鲜卑社会转型时期庶长子的尴尬处境	吕一飞 (239)
汉晋之际西南夷中的“叟”及其与蜀的关系	石 硕 (247)
“一统化”与“多元性”：观察秦汉魏晋巴蜀史的重要线索	杨 民 (272)
评历代咏马嵬诗 ——兼议杨贵妃文化现象	王炎平 (283)

佛教造型艺术品在三武一宗法难中的被毁和幸存考	张 箭 (302)
《茶经》“精行俭德”新解	缪元朗 (321)
隋末唐初岭南政治势力探析	罗 凯 (326)
晚宋名相郑清之考论	胡昭曦 (346)
宋代“政治神学”危机与新“天命”的建立	刘复生 (369)
从药名异译论西夏医方的性质	聂鸿音 (394)
宋代史学名家张唐英生平与著作考论	粟品孝 (409)
竞争与认同：从历日颁赐、历法之争看宋与周边民族政权 的关系	韦 兵 (423)
《朱子读书法》六条目的传衍与变异	李晓宇 (441)
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	黄 博 (458)
明代刘大夏销毁郑和下西洋档案考辨	李映发 (474)
郴州袁子让生平与家世及师友考证	周 斌 (491)
重庆奉节县现存最早清代珍稀彩绘《夔州府图》略释	李勇先 (506)
不读汉宋书，也争汉宋学：清代汉宋之争“风气”的形成	张 循 (517)
征厘与垄断	
——《巴县档案》中的晚清重庆官立牙行	周 琳 (557)
金川“番目”入旗	
——清代中后期八旗制度的开放与封闭	徐法言 (593)

《蜀王本纪》“左言”“左衽”辨释及推论

蒙 默*

《文选》左思《蜀都赋》刘渊林注引扬雄《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民椎髻（当为‘髻’之讹），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扬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折权、鱼易、俾明。其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蜀王本纪》早已亡佚，引者文字异同至夥，上引二节虽大致相同，而“左言”“左衽”之差则颇大，盖“左言”为语言之异，而“左衽”则服饰之异，虽仅一字之差而其意义相去甚远。然旧日辑者如洪颐煊、严可均皆清世名家，则仅著“左衽”而舍“左言”^①，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又仅著“左言”而舍“左衽”；以后王文才先生《蜀志类钞》虽两者并录，而不着可否之辞。其是其非，不可不辩；其余诸端皆姑置勿论。

经检诸书，其引《本纪》之文，作“左言”者远较“左衽”为多：

* 蒙默（1926—2015），四川盐亭人，195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政治系，1961年由中国科学院历史所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工作，1985年任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南方民族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教学。

① （清）洪颐煊辑：《蜀王本纪》，见氏著《经典集林》卷14，民国十五年陈氏慎初堂影印本。（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51~54，全录洪辑以入扬雄卷，仅增1条，而又未予说明。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

《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侮食来王，左言入侍”句下，李善注引扬雄《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民椎髻左言。”此引最与刘渊林引相合。《文选》左思《魏都赋》“或魋髻而左言”句下，李善注引扬雄《蜀记》：“蜀之先代，人椎结左语，不晓文字。”此引与上显为同出一本而文稍省易，亦古人引书之旧习；其改作“左语”者，盖以“左语”释“左言”故。又案《路史·前纪·蜀山氏》云：“蚕丛纵目，王瞿上，鱼凫治导江，逮蒲泽、俾明时，人民椎结左言，不知文字。”此虽未明言引自《本纪》，然自上下文审之，则亦显据《本纪》为说。益明《本纪》“左言”之说绝非误说。然《御览》引《本纪》之作“左衽”虽仅一处，当亦非向壁虚构。检《华阳国志·序志》言：

《本纪》既已炳明，而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又言蜀椎髻左衽，不知文书，文翁始知书学。

是常璩之世（晋时）已有“蜀椎髻左衽”之说，唯常氏所见盖为“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之言，而显非扬氏《本纪》之说。然唐宋之传《本纪》者、清世之辑《本纪》者竟多舍“左言”而取“左衽”，诚皆鲁莽之甚者也。

“左言”者何？《文选·六臣注》载唐吕向曰：“侮食、左言，蛮夷国也。”此为释“左言”之最古者。谓之“蛮夷国”者，盖以蛮夷之饮食语言皆与华夏不同故也。且“左”字于古汉语中有卑、下之意。古代华夏之人歧视蛮夷，称之为“蛮左”，为六朝人常用语辞，如《水经·江水注》言：“武陵有五溪，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陈书·欧阳頠传》：“除天门太守，伐蛮左有功。”《陈书·淳于量传》：“荆雍之界，蛮左数反。”而王朝亦以招抚蛮夷所建立之郡县名为“左郡”“左县”，如《宋书·州郡志》载：南豫州晋熙郡太湖左县：“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以豫部蛮民立。”南城左郡：“孝建二年以蛮户复立。”边城左郡：“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南朝所立左郡、左县颇多，虽不必一一载其皆因“蛮民”以立，而其地之有蛮左则皆可以考知也。蛮夷所居郡县既可名左郡左县，则蛮夷所操语言称为左言、左语，固亦其宜；故扬雄、左思、王元长并以写入篇瀚，唐世王维犹有“封章通左语，冠冕化文身”^①之句，故《辞源》释“左言”“左语”为外国、外族语言，实为确解。蜀人“左言”为秦灭蜀前之蜀人；并非华夏之族，《汉书·地理志》言：“巴、蜀、广汉本南夷”，是为实录。近世蜀地出土先秦文物并皆可证。唐卢求《成都记·序》言：秦灭蜀后，“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②。秦言为华夏语之一支，是蜀在秦灭蜀前之为左言，唐人犹及知之。而自秦灭蜀后，秦、楚大量移民巴蜀，而蜀王又率其族人南迁巴陵；故《华阳国志》言蜀地“俗染秦化”，而巴地则“其人半楚”（见《蜀志》《巴志》），及至两汉之世，巴蜀文化则几已与华夏不别矣。

巴蜀文化至两汉虽已丕变，然犹有古蜀之孑遗存焉。如出土文物两汉之画像砖石，其人物发式多做椎髻，当即“蜀人椎髻”之残留；又许慎《说文》、扬雄《方言》亦犹可见三数巴蜀梁益之异读语文，或亦蜀人“左言”之残余，唯皆单言支字而无连缀成词语者，难以考见其语言系属也。至《本纪》所载之蜀王名称无疑亦皆蜀之左言，故多不可以汉字之义释之。而近日学者或有以汉字形义相解者，宜其多扞格而难通也。如蚕丛，或以为发明养蚕之祖，夫“蚕丛始居岷山石室”，岷山在今阿坝州，汉为冉駹夷所居，据《后汉书·冉駹夷传》：其地“土气多寒。在盛夏

^① （唐）王维著，（清）趙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卷7《送李判官赴江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卢书早佚，此序收入明代杨慎编录的《全蜀艺文志》卷30，北京：线装书局点校本，2003年，引文见第781页。

冰犹不释”。此岂宜于桑蚕之土！若以“蚕丛”为汉字记音之左言，本与汉字之字义不涉，而以少数民族相近之音读校核，则似犹有可以疏释者。余尝以“蚕丛”“冉驥”二词相校，案“冉”古音在谈部，“蚕”古音在侵部，两部古多通用，而“丛”、“驥”二字古音皆在东部，古本相通。是蚕丛、冉驥音读本通（参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蚕丛始居于岷山石室中”，《汉书·武帝纪》师古注引应劭曰：“蜀郡岷山，本冉驥是也。”是蚕丛、冉驥住地亦同。《冉驥传》言“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亦与蚕丛“居石室中”之说合。据《太平寰宇记》，唐宋茂州“本冉驥之国”^①。此茂州即今阿坝州之茂县等地，近世以来于茂县境内发掘数以百计之石棺葬，学者多以为即冉驥夷之墓葬，其时代略当战国西汉间。^②此与《华阳国志·蜀志》言“周失纪纲，蜀先称王，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相合。是蚕丛与冉驥之葬式同为石棺而其时代又皆在战国之际。（案春秋时唯周称王，楚自谓“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亦自称王；其他诸侯之称王者皆在战国时，周失纪纲，此为最甚。）近世茂汶地区所居为羌人，羌人称石棺葬非其先人之物，而为“戈基呷钵”（戈人墓葬）。相传戈基为纵目人。^③此与《华阳国志》蚕丛纵目之说亦合。综上所述，故余以为蜀王蚕丛盖即冉驥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8《剑南西道七·茂州》，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7年，第1572页。

^② 参见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七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③ 参见胡鉴民《羌民之信仰与习为》附注②，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边疆研究论丛》，民国三十年成都印行。

之异写，亦犹开明王南迁印支而为安阳王，皆一音之转也。^① 或以常氏所言有异于《本纪》“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之说（《蜀都赋》刘渊林注引），然据上述，孰为可信，固不待辩也。

又如杜宇，校以南方民族传说，则亦有颇可申说者。《本纪》载古蜀王之名，或记杜宇则无蒲泽，或记蒲泽则无杜宇。^② 此蒲泽与杜宇之关系如何，仅据现存《本纪》佚文，不可得解。《华阳国志》言：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是杜宇之即蒲卑，犹鳖灵之即开明，一为人名，一为国名（或王朝名），故《本纪》之不同时并列也。然无论杜宇抑或蒲卑，并皆民族语之汉字记音，不可据汉义为释也。《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本纪》言：“朱提有男子杜宇，自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作“从天而降”，《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作“从天墮，止朱提”，其义并同。从天下降，显为神话。然此神话与贵州仡佬族传说其祖先系从天庭而下之说相同。^③ 仡佬祖先来到地上开荒辟草耕种田地，其功绩受到各族人民崇敬。有些民族尚有祭祀仡佬祖先之俗。^④ 亦与《华阳国志》所言“杜宇教民务农……巴地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之俗相合。杜宇所自起之朱提，亦为一民族语地名。古朱提今云南昭通，据今可考者论之，其地自古即为濮僚民族所居。作于魏晋间之《永昌郡传》

^① 参见蒙文通《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收载《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② 《文选》卷4《蜀都赋》刘渊林注引《本纪》、《古文苑》卷4《蜀都赋》章樵注引《本纪》，皆有蒲泽而无杜宇，《太平御览》卷888引《本纪》有杜宇而无蒲泽。三书均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参见吴秋林等《居都仡佬族文化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352~359页。

^④ 参见翁家烈《仡佬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载：“朱提郡治朱提县，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①是其地当有僰（濮）人；元李京《云南志略》载：“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②《皇清职贡图》亦言昭通有土僚。朱提于唐宋后虽为彝族先民乌蒙部所据，彝人称其地为“濮窝”，即濮人所居之意。杜宇既起自濮人所居之地，宜其亦为濮人。“濮”为仡佬族之古称，至今贵州仡佬族某些支系自称中犹冠以“濮”音，如濮仡佬、濮偶、濮佬、濮告、濮尔等皆是。^③杜宇国号蒲泽，蒲濮同音，蒲泽之名称格式亦与濮仡佬、濮偶等略同，而其祖先传说又与濮僚相合，因此，余颇以杜宇宜亦古濮人之一支，起于朱提而称王于成都平原。于此犹有可论者，先君子《巴蜀史的问题》参考“蒲泽”当从常志作“蒲卑”为是。^④盖杜宇始治郫邑，郫原何名，已不可考，以杜宇之国名蒲卑，蒲为族称，而地遂膺“卑”名；唯后世汉字孳乳，其为邑名者多增邑旁，“卑”遂写作“郫”，犹“丘”字后世多作“邱”，此为汉字常例，固无不可。后世不明“蒲卑”与“郫邑”之关系，遂乃讹“卑”为“泽”。然无论作卑、作泽，皆为以汉字记夷音，其义则不可晓，故后世字书释此“郫”字于地名水名外别无他解，而此字竟为生僻字。然此字虽释读为难，而郫邑之为蜀中古都则不可诬也。《本纪》言“望帝积百余岁委国授鳖灵”，“鳖灵即位号曰开明”^⑤。《路史·余论》谓“鳖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案开明亡于秦惠

^① 转见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页。

^② 王叔武校注：《云南志略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94页。

^③ 参见另文《仡佬族自称的演变》（待刊稿）。

^④ 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初刊《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59年第5期，后经两次重要修改补充，收入氏著《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后又收入《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是为最后定稿。

^⑤ 此系节引《文选》卷15《思玄赋》李善注引《本纪》。

王后元九年^①，为公元前 316 年，则鳖灵即位略当公元前 666 年；而杜宇王蜀则略当公元前 800 年左右，时值西周宣幽之世，是郫之为蜀中古都略在 3000 年左右，较成都之为蜀都犹早四五百百年，噫嘘噭，连续存在 3000 年之古都，是于海内实罕其匹！然而世之为政者竟有人因此“郫”字难于解读而拟废弃之者，此实唏嘘可叹。试问“沃尔玛”“麦当劳”“伊藤”等名招其可以汉义解读乎？然群众固趋之若鹜。而此辈口中犹高唱尊重、保护历史文化，岂非梦呓乎？实令人忍俊不禁也。

《本纪》又言蜀开明之首王为荆人鳖灵，然亦有引作鳖令者，如《事类赋》卷六、《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路史·余论》亦作鳖令。灵、令二字本音近相通，因有学者以汉义为释，遂以此“令”字为令长之令；而《汉书·地理志》牂柯郡又适有鳖县，于是遂生鳖灵为楚鳖县县令之说，鳖令北上溯江至蜀，为杜宇之相，治洪水，后遂受禅为蜀王。^② 案汉牂柯鳖县为今贵州之遵义，处贵州省中部偏北；而楚都郢，即《楚世家》“文王始都郢”之“郢”，系今湖北省之江陵，周成王始封楚熊绎地，在今湖北之枝江（参宋翔凤《过庭录》卷九）。鳖与郢都相去甚远，且有武陵山区相隔，唯有两路可通：一为自楚溯江入巴，再溯乌江而上；一为自楚南渡洞庭，再溯沅江由黔东陆行至鳖。此二路亦即俗传楚将庄蹻王滇之二路，然时已当战国晚期。^③ 而以鳖灵当时楚国四周形势审之，楚国实不能有此鳖地而置县令。上已言鳖灵为蜀王略当公元前 666 年，则其在鳖为时更早，而楚君之与鳖灵同时者略当楚武王、文王、堵敖之世，约为公元前 740 年—前 672 年，其时楚虽始大，而其疆域尚非辽阔，《左传》载沈尹

① 参见《史记》卷 5《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73 页。

② 皆见《太平御览》卷 888 引《本纪》。

③ 参见蒙文通《庄蹻王滇辨》，初刊《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63 年第 1 期，后收入氏著《巴蜀古史论述》及《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

戌言：楚“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杜预注：“方百里为一同，言未满一圻。”古“方千里为圻”^①。言楚之国土其时尚未及方千里也。麇君之巴，春秋时尚据有清江流域，至战国始为楚所灭而为楚之巫郡^②；而庸国在春秋前期尚据有今鄂西北之竹山南至三峡奉节等地，至公元前 611 年秦、楚、巴三国灭庸，而庸地始归巴，巴益强大，其后与蜀国联军攻取楚兹方之地（今湖北松滋），时在战国楚肃王四年。^③ 是春秋之时楚不能溯长江、乌江而有鳖地也。自南路言之，楚之南为洞庭、彭蠡，其时为三苗后裔之国，至吴起“相（楚）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吴起相悼王略在公元前 382 年前后，已是战国中期。^④ 此时楚始有洞庭之地，是春秋时期楚亦不能南涉洞庭溯沅江而有鳖地也。楚于春秋时期尚未能有鳖地，又何能任命鳖县县令！且郡县制虽已起自春秋，然晋之县官为县大夫，楚之县官为县尹、县公，秦、齐县官固名县令，然已在战国时期。^⑤ 是春秋时期楚虽已有县制之设，然绝无县令之官，而自鳖灵时楚国四周形势审之，楚实不能拥有鳖县之地，皆明鳖灵确不能为楚之鳖令。此不可信据说法之出台，实乃为以汉义释民族语言之所

^① 并见（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三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1493 页。

^② 参见唐代梁载言《十道志》，载清代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1 年。

^③ 参见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之《巴蜀的史迹》，载《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

^④ 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二·六六之《吴起去魏相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90~191 页。

^⑤ 晋为大夫，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闵公元年、哀公二年，楚为县尹见庄公十八年，县公见宣公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秦县置令明文见《史记》卷 5 之《秦本纪》孝公十二年及卷 86 之《商君列传》。《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是时已置县，在公元前 688 年—前 687 年；然是否置令，则不可知。齐置县令见《史记》卷 126《滑稽列传》齐威王时（公元前 356 年—前 320 年），已是战国中期。

误也。

蜀中左言地名之可言说者尚有“湔山”。《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本纪》言：鱼凫“猎至湔山，便仙去”。此湔山或作“煎”（《古文苑》王褒《僮约》及章樵注），又或作“前”（《尚书·禹贡·正义》引郭璞《尔雅音义》），皆为同音异写。此湔山即玉垒山，章樵已于《古文苑·注》中数言之也，盖湔为民族语名而玉垒则华夏语名也。此湔山北起茂汶，南至灌口，为江水、湔水之分水岭，后世亦称东岷。^① 涅水、湔县、湔堋、湔氐等名皆因此湔山而得名。《汉志》出玉垒之湔水，盖在玉垒东侧，近彭州之湔江是也。湔堋之名盖因湔山，晋刘渊林注《蜀都赋》云：“李冰于湔山下造大堋以壅江水，分散其流，灌溉平地”，言之甚明也。郦道元盖仅知湔之为水而不知其源在玉垒东，更不知湔堰之名缘于湔山，故在《江水注》中误以湔水在都安以上入江，江、湔互受通称，都江大堰遂得湔堰、湔堋之名，而不悟此显与《汉志》湔水“东南至江阳入江”之文不合。而杨守敬之流，不审道元之误说，又从而为之辞，于《江水疏》中妄以“今灌县北有白沙河，疑即湔水”，造为“湔水导源玉垒，湍流赴江（在灌县西），又自江分派，乃得为湔水也”（都江大堰为湔水所分，故又谓之湔堰）。湔水又自灌分流，东经崇宁县、彭县为青白江，又经新繁、新都、金堂，至汉州东南会洛水，所谓于湔水合也）。^② 近世之编纂历史地名辞书者遂多以郫西之江沱^③下合绵、洛者为湔之正流，而湔遂冒沱名，湔水之出玉垒东侧益不为人所知，此

^① （唐）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志》卷33茂州汶川县载：“玉垒山：在县东北四里。”卷32彭州导江县载：“玉垒山在县西北二十九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汶川县治今阿坝之汶川县；唐导江县治在今都江堰市东导江铺；西北二十九里即今都江堰市西北郊之玉垒山，有玉垒关，今犹在。

^② 括弧内所引皆《江水疏》之文，盖以杨释杨也。

^③ 《汉书》卷28上《地理志》记蜀郡郫县：“《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第1596页。